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

# 党员队伍年轻化，增强党性更为紧迫

宋宗君 李斌雄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项战略部署，鲜明指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

这一重大判断，深刻揭示了增强党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当前，年轻党员和干部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引导他们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增强党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把增强党性摆在如此重要位置？党性修养与纪律约束、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之间是什么关系？怎样通过增强党性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根基？这些重大问题需要从更深层面去理解。

## 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把增强党性定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细胞健康，肌体才强健；党员党性坚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有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这就抓住了管党治党的根本。

从历史逻辑看，重视党性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原则，到1941年通过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从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到改革开放初期鲜明提出“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9次党内集中教育，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我们党百余年来之所以能在一次次考验面前勇往直前，靠的就是坚强党性。

从现实逻辑看，这是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固本之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大挑战”将长期存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员干部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党性问题。截至2025年底，全党45岁及以下党员占43.8%，干部队伍中“70后”、“80后”已经成为主体，“90后”逐步成长起来。年轻同志学历高、视野宽，但相对缺乏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大风大浪考验。如果不抓紧增强党性，就有祸起萧墙、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

## 党性修养与纪律约束、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在框架安排上，把“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作为第一项战略部署，紧接其后依次部署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组织体系、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种布局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

党性是根本，决定着纪律约束、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纪律是成文的规矩，制度是刚性的约束，反腐败是霹雳手段，但这些外在约束最终要通过党员、干部的内在自觉才能真正起作用。制度再严密，也要靠有党性的人去执行；纪律再严明，也要靠有党性的人去敬畏。没有坚强党性作根基，制度就可能成为“稻草人”，纪律就可能成为“橡皮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一些干部在“四风”问题上反复失守，在腐败诱惑面前败下阵来，根子都在党性动摇、私心作祟。

纪律约束、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是保障，反过来有利于锤炼党员、干部的党性。党性修养不是闭门修身、坐而论道，而是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在刚性的制度规范中、在严肃的反腐败斗争中淬炼而成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的约束，最终都是为了倒逼“不想腐”的自觉。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正是要通过他律的强化促进自律的升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决定》通篇贯穿这一辩证思维：既部署“固本培元”的党性教育，又部署“架梁立柱”的制度建设；既亮出“打虎”“拍蝇”“猎狐”的反腐利剑，又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只有把党性教育的“软”与纪律、制度的“硬”统一起来，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贯通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标本兼治。

## 按照《决定》部署把增强党性要求落到实处

《决定》提出，必须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先锋队意识，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下功夫。这六个方面，凝练概括了增强共产党人党性的基本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

把对党忠诚摆在党性修养的突出位置。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对党不忠诚就半点党性也没有。这种忠诚是绝对的，“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顺风顺水时表现还可以，一遇沟沟坎坎就心生杂念、打小算盘，不能算绝对忠诚。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途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要深化“四史”教育，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坚守共产党人价值观；挖掘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忠信、尚气节、知廉耻、存戒惧、重自省等道德观念，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涵养浩然正气，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在实践锤炼和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砥砺党性。党性是在实践中炼出来的，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要推动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应对重大风浪考验中锤炼党性，在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得和失等关系中磨砺党性。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反对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真正使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热起来。

加强党性鉴别，树立鲜明导向。党性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可衡量、可检验的。《决定》要求把党性作为干部考察和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注重从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表现识别党性，从日常工作、个人言行、社会交往、家教家风研判党性，通过上级评价、同级互评、下级反映、群众口碑了解党性。要把党性鉴别结果用起来，让党性坚强的干部受褒奖、受重用，让党性不强的干部受警醒、受惩戒，使讲党性、重党性、强党性在全党蔚然成风。

党性坚强，则百邪不侵；党性涣散，则百病丛生。从1941年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2026年新征程上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部党的建设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共产党员锤炼党性、砥砺初心的历史。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炼党性、驰而不息肃纪律、扎紧笼子强制度、雷霆之势反腐败，就一定能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分别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分中心研究人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分中心研究人员，武汉大学二级教授，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 推动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从分头管理走向协同治理

李媛媛

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见证。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利用，建好用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文化中心城市。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文化交流枢纽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进一步加强其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需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遗产安全维护和协同治理，探索以关键节点带动区域协同，推动全流域大保护格局的构建。

推进长江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要尊重遗产形成发展的历史联系，维护遗产本体及其所依托的文化生态。要遵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内在规律，加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持续实施。要将保护传承各项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在统一规划和制度保障下加强全过程管理，使文化遗产得到持续有效保护，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延续其生命力。

“十四五”时期，武汉持续加强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进文物资源调查、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和重点遗址研究展示，已打下很好的工作基础。迈入“十五五”，保护传承弘扬使命更加重大，长江文化遗产跨区域、跨类型的特点，对现有分类管理和属地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贯通不同部门的资源信息，加强保护任务衔接，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成为推进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重要内容。立足武汉文化资源禀赋和保护基础，先行探索遗产整体识别，落实保护任务执行，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可供沿江地区借鉴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为更大范围的流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创造条件。

## 绘制“一张图”，完善流域文化空间认知

长江干流湖北段绵延1061公里，流经8个市（州）、41个县（市、区），沿线分布着古城遗址、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利遗产、工业遗产等资源也各具特色，涉及多个部门的调查与管理。将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纳入统一的流域空间图谱，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遗产资源历史地理信息、分布状况，为统筹保护范围、识别潜在风险、确定保护重点提供科学依据。武汉正在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已具备较好的数字化空间治理基础。应在此基础上加强文化遗产专题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将物质遗产及其历史环境、非遗传承空间纳入考量。整合各类已收集的遗产信息，结合古河道、滨江岸线和历史聚落格局，系统呈现文化遗产与流域环境的空间联系。同时动态标注遗产保存状况、保护范围和风险隐患，提升资源识别与监测预警能力，为长江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供全面空间信息支撑。

## 建立“一清单”，健全保护任务落实机制

长江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其历史价值、保存状况和保护需求各有特点。沿线既有需要加强本体保护和环境维护的重要遗址，也有需要兼顾空间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涉及多部门和多样实施主体。依托“一张图”形成的资源信息和风险研判成果，统筹遗产本体及其关联环境的保护需求，科学确定保护任务的轻重缓急，有利于合理配置保护资源，推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要求落到实处。应结合武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根据遗产价值和保存状况，以重点保护、风险整改和活化利用为目标，分类制定清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岸线利用等融合发展。依法落实保护前置要求，将重点任务与资金安排、项目管理和督导评估相衔接，明确责任主体和实施时限，定期更新任务清单，推动整体保护要求得到持续有效落实。

## 搭建“一平台”，提升部门协同治理效能

长江文化遗产跨区域分布、跨领域管理的特点，使得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要求高、任务重。沿线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文物、文旅、住建、自然资源、水利等多个部门，相关工作与城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密切联系，保护任务的落实需要不同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立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有利于加强遗产资源信息共享，促进保护要求与相关业务有效衔接，推动各项保护任务协调实施。2026年，武汉都市圈九市签署文旅协同发展合作事项书，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也为区域文化合作提供了实践基础。可在此基础上探索文化遗产协同治理，将资源识别和任务管理成果转化为持续有效的保护行动。要整合“一张图”的资源信息和“一清单”的重点任务，加强文化和旅游、自然资源、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部门间信息共享。涉及重要遗产区域的规划建设，要加强项目会商和专业论证，推动保护要求提前落实。同时，发挥武汉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的优势，吸纳专业研究力量参与遗产价值阐释和保护决策，畅通遗产地社区、非遗传承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渠道，完善保护成效评估与信息反馈机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

武汉应发挥两江交汇的区位优势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优势，探索加强长江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工作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强与湖北沿江城市的交流合作，促进试点成果共享、经验互鉴，为全省乃至全流域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参考，服务长江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建设。

（作者为武汉商学院创意设计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青马在线

# 历史正义不止于记住苦难，更要讲清罪责

王彤

202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9家出版社中仅1家在使用“侵略”一词表述侵华战争，2025年全国初中新版教材已将“南京大屠杀”替换为“南京事件”，卢沟桥事变的起因被改写为“日军在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侵略被歪曲为“自卫还击”。

这些改写看似只是教科书中的措辞调整，实则是在改写人们理解战争的方式：谁制造了苦难、苦难因何发生？面对这种以措辞抽离责任、以叙述颠倒因果的动向，澄清事实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叙述、历史评价和历史纪念三个层面作出有力辨析。由此，历史正义就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必须回答的三个具体问题：如何讲清战争苦难背后的侵略罪责？如何识破历史评价中的认知陷阱？如何让纪念活动唤起守护和平的主体自觉？

## 让历史叙述揭示侵略罪责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同样不是抽象的立场宣示，而要落到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是非辨析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都是侵略者实施暴行的罪证。这些史料之所以不可替代，在于它们使苦难与造成苦难的具体行为相联系，让侵略责任有据可查。而如何讲述这些史实，关系着苦难能否被正视、罪责能否被承担。如果将有明确加害者的暴行笼统归结为“战争的不幸”，就会在看似悲悯的叙述中淡化侵略责任。只有把苦难的事实与造成苦难的责任一并讲清，才能使对生命的尊重、对侵略的反对，成为有事实支撑、有明确指向的正义立场。叙述层面的辨析，解决的是“谁制造了苦难”；评价层面的辨析，则要进一步回答“如何理解这些事实”。

## 让历史评价穿透认知陷阱

辨析具体的历史问题，要注重把握历史联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侵略者在中国修建了铁路、工厂，对此如何评价？设施是否建成，只是认识的起点；设施由谁控制、为谁服务、代价由谁承担，才是理解其历史影响的关键。孤立强调设施建设，却回避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就可能把局部事实变成美化殖民统治的材料。铁路、工厂的修建，并不能为殖民统治提供正当性，也不能抵消殖民侵略的迫害性。只有把设施建设放回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利益格局中，才能真正阐明这些建设的目的、代价，防止以所谓局部的“建设之利”掩盖整体的“侵略之害”。

## 让历史纪念唤起和平自觉

对历史的认识，要转化为维护和平的自觉。同样的纪念仪式，用于揭露战争罪行，是对历史的警示；被当作荣耀炫示，则会沦为对侵略的美化。因此，纪念活动要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悼念无辜死者，批判军国主义，倡导和平友好。如此才能使纪念活动成为历史的警示，使逝者的追思成为和平的教育，使共同的记忆成为抵御战争、维护正义的精神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要以正确的历史叙述揭示真相、以深刻的历史评价廓清迷雾、以自觉的历史纪念倡导和平，让苦难的记忆成为警醒的力量，让不屈的抗争成为前进的精神，让历史的回响成为和平的基石。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专业博士研究生）

# 党组织把奔跑在路上的力量凝聚起来

刘涛

我叫刘涛，是一名预备党员，2008年因事故失去右臂，2011年进入快递行业，十五年单手送出超百万件包裹。2022年，在江夏区委组织部和桥南社区党支部支持下，我发起成立“红骑侠”志愿服务队，如今队伍已发展到280余人。从一个人奔波街巷，到带领一群人参与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这些年我最深的体会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句口号，它不仅体现在制度和纪律上，也体现在基层干部作风的转变，党组织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和引领中。

## 作风转变，诉求有了回应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到底改了什么？对我们一线劳动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推诿扯皮少了，主动服务多了。过去，快递员、外卖骑手遇到劳动纠纷、权益受损，常常投诉无门。想反映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流程怎么走。但这几年情况有了明显转变，2026年初，江夏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了一场迎春座谈会，区委组织部、区总工会、区交通运输局等16个部门相关负责人悉数到场，面对面听我们骑手说难处。围绕职业技能培训、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诉求，各部门当场认领问题、敲定办理时限。

从过去不知道找谁反映，到如今有部门接手、有结果反馈，我们感受到的是基层干部的作风转变、是办事渠道更加通畅。对我们来说，作风好不好，就体现在能不能真正站在群众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党就在身边。

## 党组织把分散的骑手凝聚起来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我对这句话有切身的感受。曾经，我们这群人是最分散的，各自奔波，没有组织归属。2022年队伍刚成立时只有十来人，凭一腔热情做事，但缺乏方向感和凝聚力。转变就在于党组织的引领，2026年，在江夏区委组织部和江夏经济开发区综合党委指导下，队伍党支部在桥南社区正式成立，同步设立“流动党员之家”。支部把组织建在街头巷尾、建在奔波路上，吸纳流动党员、退役军人亮明身份、回归组织。

有了党组织，队伍有了方向，大家干事的劲头也更足了。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建立闭环处理机制，骑手发现问题拍照上传，城管、水务、交管等部门即时联动处置。截至目前，累计上报并推动解决社区各类难题3800余件，解决率达98%。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带来的精神引领，党员骑手焦浩说得好，“以前跑单路上遇到事儿，心里也打鼓，怕处理不好惹麻烦。现在队里党员、退役军人经常交流，驿站还搞过急救培训，再碰上这种事，心里是有底的”。在党组织感召下，多名青年骑手递交了入党申请。

有人问，快递骑手搞志愿服务就行了，为什么还需要党的建设？我的理解是：新兴领域从业者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流动性强，如果没有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就容易成为“散沙”。我们跑遍街巷，最能发现城市角落的需求，但过去发现问题不知道找谁，反映了石沉大海，热情很快就消磨了，是党组织打通了“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闭环，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行动的价值。2025年12月，我们获评湖北省青年志愿服务“社区计划”十佳项目；2026年3月，队伍在武汉青年“3·5”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上被授旗。这些荣誉背后，正是党组织把新就业群体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作用发挥出来的生动实践。

## 从城市奔跑者到治理参与者

党组织不仅把我们凝聚起来，也让我们有了服务城市，回馈社会的方向和动力。当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冒雨来到驿站，为我们颁发“流动网格员”证书、张罗集体生日会时；当75个爱心驿站为我们撑起歇脚、饮水、充电的港湾时；当司法局、红十字会的同志把法律知识和急救包送到我们手上时，我们真切感受到，党没有忘记我们这群在路上的人。这份关怀，最终变成了我们回馈城市的行动。2026年4月，武汉三环线发生严重追尾事故，我们3名队员挺身而出，踹碎挡风玻璃、脱下衣服为伤者止血，在车流中指挥交通，直到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从城市奔跑者到基层治理参与者，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新就业群体需要党组织的关心和引领，基层治理也需要新就业群体的参与。今后，我将继续带领“红骑侠”队伍在路上奔跑，让这抹“志愿红”在街巷间越传越暖。

（作者为预备党员，中国快递协会“快递小蜜蜂”，现为“红骑侠”志愿服务队队长）

基层笔谈全面从严治党